

宋元以来闽西社会的土客之争与佃农斗争

刘永华

闽西位于福建西部，包括龙岩地区的全部（即龙岩、永定、上杭、武平、连城、漳平、长汀）与三明地区的一部（即宁化、清流、明溪、永安）。在地理上，这里基本上是山区。

本文旨在对宋元以来闽西社会结构的变迁作一初步考察。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本文先从分析明中叶以后闽西赣南的主佃斗争开始，再追溯宋元时期的土客之争。

一、明中叶以后闽西赣南的主佃斗争

明末清初江西名流魏礼在写给一位李姓县令的信中，记载了当时宁都农村的主佃斗争：

宁（都）乡属乡六，上三乡皆土著，故永无变动，下三乡佃耕者悉属闽人，大都建宁、宁化之人十七八，上杭、连城居其二三，皆近在百余里山僻之产。东南变起，附贼窥城不克，则盍诸佃户，谓吾为汝等革去数百年旧例。于是聚诸游手，称欲贿官集事，持械入庄，头会箕敛，无钱者则攫其农器畜粒而去，自称田兵。^①

地处赣南的宁都一县的“主佃斗争”实际上仅是赣南与闽西北自明中叶以降一系列斗争中的一例。根据傅衣凌先生的考证，早在正统以后，“这两省的边缘，即以闽西北和赣东南为中心的广大丘陵地区里，差不多都在动乱中过日子”，据他的统计，自正统（1445年）至崇祯元年（1627年）共一百八十年的时间里，差不多平均每隔二年多即有一次叛乱。^②

对于这场持续时间很长、影响深固甚广的“佃农风潮”发生的原因与性质，历史学家已经提供了几种不同的解释框架。有的历史学家利用阶级分析法，认为佃农风潮的主要原因是主佃矛盾相当尖锐。^③我们认为，这种解释框架有其局限性，它在一些地区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比如在上述魏礼的书信中，魏氏很清楚地对比了宁都上三乡与下三乡主佃关系的巨大差别，上三乡“永无变动”，说明当地主佃关系是相当和睦的，而下三乡则相反，主佃矛盾异常激化，甚至出现佃农组织起来“持械入庄”的事件。在这一问题上，阶级矛盾的解释框

^①魏礼《魏季子文集》卷八，“与李邑侯书”。

^②“明末清初闽赣毗邻地区的社区经济与佃农风潮”，《社会科学》第三卷第三、四期。

^③如傅衣凌先生在前揭文中即持此说。

果就稍嫌牵强了。魏礼书信给我们一个启示，宁都县上三乡与下三乡的主佃关系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差别，不是由于阶级矛盾，而是由于闽籍客人与宁都本地人的土客矛盾。

从史料看来，自明中叶以降赣东南的“佃农抗租斗争”主要是透过地缘关系结合在一起的。“抗租”的领导者与参与者基本上是来自闽西或广东的外地人，或者是受闽广影响很深的本地人，而他们的打击对象则是当地的江西人。如石城县，石马下吴万乾于顺治二年乙酉九月“倡永佃，起田兵”，但“邑大户上著为多，万乾恐不能胜，又要联客纲头目郑长春、李诚吾、连远候，结党惑众，名纲义约。”另外，当地尚有王振之集贤会，“纠宁都、瑞金、宁化等处客户，一岁围城六次。”^①又如瑞金县，“明季谢、阎二贼交炽，凡闽、广侨居者思应之。”^②从这两条资料我们可以看到，石城、瑞金的斗争基本上是以土著与客户而划分为两大阵营的。

“佃农抗租斗争”不仅以闽广客籍为主力军，而且江西斗争的组织方式也是来源于闽西的。关于这点，道光《宁都直隶州志》有云：“按田兵之起，始于汀州。”宁化留猪坑人黄通为了与本姓仇杀，所以创立较桶之说，“诸佃闻通言欢甚，归通恐后。通遂率千数百人攻劫城邑，号田兵。嗣是而石城之吴万乾效之，瑞金之张胜又效之，蔓延于阳都矣。”^③

赣南的“抗租斗争”之所以以闽籍客户为主力军，而组织形式又来源于闽西，这是与自明中叶以来闽人向赣南的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分不开的。这一移民运动早在明成化年间就已发端。如洪钟为成化十一年进士，初为刑部主事，后迁郎中，“奉命安辑江西、福建流民。还言福建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安远、龙南，广东程乡皆流移错杂。”^④明代后期，闽广流民涌往赣南，有增无减。隆庆二年春，张种以右金都御史巡抚南、赣，“所部万羊山跨湖广、福建、广东境，故盗数，四方商民种蓝其间。”^⑤瑞金一县，“闽广及各府之人，视为乐土，绳绳相引，侨居此地。土著之人，以士为民，而农者、商者、牙侩者、衙胥者，皆客籍也。”^⑥至清代，闽广移民更成为高潮，所谓“深山荒谷，则粤闽侨居，蛮蛋之习，有时而染”。^⑦至康熙年间，瑞金县“土著十之二三，流寓十之六七”，^⑧客籍已大大超过了土著。清初之移民，声势浩大，动辄数万。如康熙四年，福建农民流徙赣南的数万人，政府下令就地安插，造花名册。^⑨对闽西人而言，明清时期向江西的移民可能超过了向其他地区的移民，成为最为重要的移民目的地。如上杭县田背村刘氏宗族，其族人移往广东、四川等地者，但以江西为最多。^⑩

从赣南社会史的角度来看，这次移民运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早期的研究一般认为赣南社会是在唐代末年以后形成的。如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所勾勒出的客家人的五次大迁徙中，赣南是客家人第二期迁徙（其时间在唐末开始）的主要定居目的地之

^①道光《石城县志》卷七，《武事》。
^②同治《瑞金县志》卷十六，《兵寇》，杨兆年，“上督府田赋始末”。
^③见该志卷十四，《武事》。
^④《明史》卷一百八十七，洪钟传。
^⑤《明史》卷二百十，张种传。
^⑥同治《瑞金县志》卷十六，《兵寇》，杨兆年，“上督府田赋始末”。
^⑦乾隆《赣州府志》卷二，《风土》引康熙志。
^⑧同治《瑞金县志》卷十六，《兵寇》，朱三锡，“严禁退脚科敛名邑示”。
^⑨林天擎《乞鉴力役之苦勅部严禁疏》，转引自李文治等著《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⑩《田背村志》（油印本）。

一。他在书中没有提到在唐末之后还有向赣南的大规模移民。^①但是，曹树基先生的文章却揭示出，赣南山区的开发基本上是在明清时期完成的，根据他对赣南宁都、石城两县的自然村建村时间的统计，两县之自然村，建立于明以前者仅占村落总数的15.57%，^②反过来说，明清以来才建立的自然村数量在84%以上。应该说，这些自然的建立与福建移民的密切关系是不容否认的。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赣南现代客家人的村落基本上是在明中叶以后由闽粤客家人流寓此地而形成的。正是在闽粤移民大量涌入，当地资源相对紧张背景下，才发生了客籍人与本地人的各种形式的斗争，抗租斗争只是土客斗争的形式而已。另一方面，在闽西，抗租斗争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这里，抗租斗争表现出较为浓厚的阶级斗争的倾向，抗租斗争的领导者、参与者与打击对象都是本地人，而不存在主客之争。如抗租斗争最为频繁的上杭县，“康熙十三年间，乘耿逆煽乱，土究王士百、胡天明等，素非业耕者，倡众私设小斗，强抑田主，凌辱百端。”^③乾隆时期又有罗日光的抗租，从资料看来，罗日光可能是在城里横坑人（此地现居唯罗氏一姓，在县志中亦有“把守横坑”等语），他们在上杭之濂溪隘佃田，主佃双方皆本地人。^④闽西其他地方的抗租首领也多是“土棍”、“土究”或“乡人”。从档案史料来看，清代闽西佃农运动的参加者基本上是本地人。^⑤闽西与赣南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在于赣南在明中叶以来是个正在开发、重组中的社会，而闽西的社会则早已形成，并向外辐射。现在的问题是，闽西的社会究竟是何时形成的呢？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追溯一下闽西早期的开发史。

二、宋元时期闽西的土客之争

从家族系谱资料看，闽西社会是在宋元以后才开始形成的。根据民国《上杭县志》“氏族志”有关资料所进行的统计表明，上杭之各姓氏，五代时迁入者有一姓，宋代迁入者有二十七姓，元代迁入者有三姓，明代九姓，清代一姓（见下表）。这说明上杭现在的大部姓氏是在宋代特别是在宋元之交迁入的（在宋代迁入上杭的二十七姓中，声称其祖先自宋季迁入者有十八姓，若加上自南宋迁入者则共有二十姓）。就时间而言，汀汀、宁化等县汉人定居的时间也许会早一点，但总的说来，汀汀州府人口的长足增长是在宋代，特别是南宋以后。唐开元间，福州长史唐循忠携引诱遁逃户三千余置汀汀州。贞元杜佑作《通典》时，户增至五千三百三十，口万五千九百九十五。至宋代汉人大量迁入，人口日滋。《元丰九域志》已载主户六万六千一百五十七，客户一万五千二百九十九，比唐代增加了好几倍。至南宋庆元年间，更增至主客户二十一万八千五百七十，主客户丁四十五万三千二百三十一，比元丰年间

^①《客家研究导论》第6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复印。

^②曹树基“明清时期的

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第20页。

^{③④}同治重刊乾隆《上杭县志》卷十二，杂志。

^⑤参见《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044号：“福建长汀县赖鼎献将田顶后仍借回耕种年纳租谷二石”；第078号：“福建省连城县赖石亨租许宣尝田歉年仍要照额纳租”；第363号：“福建上杭县戴启亮说佃户所交租谷中有朽谷而令补交”等等。

上杭各姓氏迁入时间统计表

年 代	五 代	宋 代			元 代	明 代	清 代
姓 氏	郭 氏	丁 氏	吴 氏 ※	张 氏 ※	胡 氏	方 氏	余 氏
		卜 氏 ※	何 氏 ※	温 氏 ※※	袁 氏	宋 氏	
		王 氏 ※	李 氏	黄 氏 ※	莫 氏	卓 氏	
		孔 氏 ※	官 氏 ※	曾 氏 ※		俞 氏	
		包 氏	周 氏 ※	华 氏 ※※		汤 氏	
		丘 氏	林 氏 ※	詹 氏 ※		雪 氏	
		江 氏 ※	姜 氏 ※	谢 氏		协 氏	
		朱 氏 ※	陈 氏 ※	罗 氏		简 氏	
		伍 氏 ※※	范 氏 ※	龚 氏 ※		严 氏	
	总 数	1	27			3	9

备注：1、此表据民国《上杭县志》卷八“氏族志”有关资料编制。

2、※号代表自宋季迁入上杭之姓氏。

3、※※号代表自南宋迁入上杭之姓氏。

又增加数倍。①以后虽经绍定之乱，人员伤亡很大，但很快恢复，至南宋宝佑间，主客户达二十二万三千四百三十二。②可见，汀州府人口之大幅度增长是在宋代，特别是在南宋庆元之后，这与前面的家族系谱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是基本相符的。

这些自宋代特别是南宋以后涌入闽西的外地移民，在各种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必然会因人口膨胀而与土著（包括当地的畬族与早先定居此地的汉族）发生矛盾。《临汀志》中就有“外邑山谷之间，亦时有弄兵珥笔为里间挠者”的记载，该志又引旧志云：“旧志谓险隘荒陋，轻生尚武，人情不甚相远。”③至元代，土客之争更为激烈，《元一统志》引《图志》云：

（汀州）西邻章贡，南接海湄，山深林密，岩谷阻窈，四境椎埋，顽狠之徒，党与相聚，声势相倚，负固保险，动以千百计，号为畬民。时或弄兵相挺而起，民被其害，官被其扰，盖皆江右、广南游手失业之人，逋逃于此，渐染成习，比数十年间，此风方炽，古岂有是哉。④

《图志》记载土著与江广客籍的斗争是在宋元时期才开始有的，这与闽西在宋代渐次开发、人口迅速膨胀的情况是基本吻合的。《元一统志》又引《上杭记》详细记述上杭、武平两县土客之争，上杭山深林密，“江右游手轻生之俦，逃聚于此，呼啸党倡，土著之民，不遑宁处。”而武平县“南抵循梅，西连章贡，篁竹之乡，烟岚之地，往往为江广界上逋逃者之所

①③《永乐大典》卷七八九〇“户口”引《临汀志》，“风俗形势”引《临汀志》。

②《永

乐大典》卷七八九〇“户口”引《临汀志》，“风俗形势”引《临汀志》。

④嘉靖《汀州府志》

卷之四，户口。

据，或曰长甲，或曰某寨，或曰畲洞，少不加意，则弱肉强食，相挺而起，税之田产，为所占据而不输官，乡民妻孥，为所剽掠，莫敢赴□，土著之民，日见逃亡，游聚之徒，益见盗横。”①《上杭记》所反映的情况当不早于北宋淳化五年（994年，是年上杭、武平建县），《上杭志》记述了来自江广的客籍与本地土著（当地早先定居此地的汉人与畲民）的激烈斗争。其结果是“土著之民，不遑宁处”，甚至出现了“土著之民，日见逃亡”的现象，与此相反，客籍之人则“益见盗横”，已逐渐在地方社会中占了上风。

宋元时期闽西的江广流寓与当地土著的斗争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明清时期江西的土客之争，这种以土客划分而组织的斗争实际上是社会正在重新组合的一个标志。就宋元时期的闽西社会而言，客人在开发与利用当地资源等方面与土著发生斗争的结果，可能是如《上杭记》中描述的“土著之人，日见逃亡”那样，客籍人征服与同化了土著，最终使他们在文化上融为一体。从“上杭各姓氏迁入时间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上杭建县于淳化五年，这是在北宋初年，当时上杭至少有几千户人家，但现在上杭各姓氏中，自北宋以前迁入者才一姓，而绝大部分都声称其祖先是在南宋特别是宋末迁入的，这种现象肯定包含了土著与客籍相互斗争、相互融合的众多信息。

闽西在宋代开始，由于人口激增、客籍人士的大量涌入，引起了深刻的社会矛盾。社会不断分化组合，最后形成了土著与客籍两大阵营，两者的斗争自宋代或更早一些时期就开始，一直延续到元代，斗争的结果是客籍人征服、同化了土著，两者在文化上融为一体。到明代，我们已基本看不到土客之争了。代之而起的是以阶级为基础的主（地主）佃（佃农）斗争和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械斗。从这一结构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到闽西的社会构成法则已从宋元时期的单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演化成了以阶级关系与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

①《永乐大典》卷七八九〇“风俗形势”，引《元一统志》。